

厦大树下

随笔集

中国经济学教育转型

——厦大故事

洪永森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凤凰树下

随笔集

中国经济学教育转型

——厦大故事

洪永森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学教育转型:厦大故事/洪永淼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4. 4
(凤凰树下随笔集)

ISBN 978-7-5615-5007-6

I. ①中… II. ①洪… III. ①高等学校—经济学—学科建设—研究—
中国 IV. ①F—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2240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xmupress.com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15.5 插页:2

字数:230 千字 印数:1~3 000 册

定价: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编者的话

厦门大学，一所闻名遐迩的高等学府，经过近百年的岁月洗礼，她根深叶茂，茁壮成长。厦大校园背山面海、拥湖抱水，早年由南洋引入的凤凰木遍布校园的各个角落，于是，一级又一级的海内外求知学子满怀憧憬地相聚在凤凰树下；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依依惜别于凤凰树下。“凤凰花开”成了学子们对母校的青春记忆，“凤凰树下”成了厦大人共同的生活空间。

建校近百年的厦门大学现已成为学科门类齐全的国家“211”、“985”工程重点大学。厦大人秉承“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铭记校主陈嘉庚建设一流大学的嘱托，在较少政治喧闹、较多自由思考的相对安静环境中，做着相对纯粹的真学问，培育着一代代莘莘学子。一大批厦大人在不同的学术领域里成果卓著，他们除了发表论文、出版专著，贡献自己高深的科研成果之外，亦时有充满灵性的学术感悟文字、感时悯世的政治评论短札，时有思索道德人生的启示益智言语、情感迸发的直抒胸臆篇什。这些学术随笔其

文字之精练,语言之优美,内容之丰富,思想之深刻,不仅体现了厦大学人深厚的学术积淀,而且也是值得传承的丰富文化宝藏和宝贵的出版传播资源。

厦门大学出版社秉承“蕴大学精神,铸学术精品”的出版理念,注重挖掘厦门大学的学术内涵。我们将以“凤凰树下随笔集”的形式,编辑出版厦大学人的学术随笔、学术短札,在凤凰树下营造弥漫学术芬芳的书香氛围,让厦大校园充满求真思辨的探索情怀。年轻学子阅读这些书札,或能获得体悟,受到激励,走向深邃的学术殿堂;社会大众阅读这些书札,或能更加切实地品读我们这所大学的真实内涵,而不至于停留在“厦门大学是个大花园”的粗浅旅游观感层次。

我们更期待《凤凰树下随笔集》走出校园,吸引全球更多的学者走入这片凤凰树下,让读者感受到这些学者除了不断有高精尖的科研成果问世外,还有深沉的文化艺术脉搏在跳动,还有浓郁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在流淌。

厦门大学出版社



序 言

王广谦

(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

洪永淼教授是国际知名经济学家,特别是在计量经济学领域成就卓著。他是厦门大学 1985 届物理学学士,具有很好的数理基础和科学素养;1986—1987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培训中心(福特班)学习,1988 年获得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学位后即赴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经济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计量经济学顶尖大师赫伯特·怀特教授和克莱夫·格兰杰教授(200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93 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任教于康奈尔大学,2001 年获得该校终身教授职位。现为康奈尔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双聘”院长,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和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1 世纪初,他怀着知识报国的理想,利用寒暑假开始在国内从事经济学教育,曾在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授课,2005 年担任厦门大学新成立的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首任院长,2010 年同时担任经济学院院长。最近,他对厦门大学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史,从学校历史、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教学改革、学术交流与国际化到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发展之路,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历史梳理、总结和思考,写成了《中国经济学教育转型——厦大故事》一书。

他在书中记录的厦大经济学教育改革和办学的心路历程,代表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典型故事。比如他在朱崇实校长爱才、敬才和强烈的事业心、责任心的感召下回到厦大;学校通过设“特区”、增量改革、双轨制给予特别支持,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把国际名校的经济学教育理念和国内实际逐步融合,得到国内同事们的普遍认可和配合。他书中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发展

经济学教育的炽热情怀，他的革新经济学教育的思想和实践难能可贵。从书中可以读到他的理想和情怀，他的坚毅和执着，可以读到 he 探索的艰辛和取得进展的欢乐，也可以读到他的国内同事的理解、配合与可爱。作为同行，我感到欣喜和敬佩。因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实在需要这样一点一滴的推进，他的改革举措对正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具有很好的参考借鉴意义。

每个国家的经济学发展都是一国特定历史阶段下，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和科学研究状况共同决定的。在中国近代以前浩瀚的文献典籍中，虽然不难查找到一些有关经济的文章和论述，但这些文章和论述体现的主要还是先贤哲人们对经济现象的一些朴素思想，并且大都是与君主的国家治理联系在一起。把经济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范畴，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深刻原因，探究经济运行循环往复过程中的基本机理和经济规律，还只是近百年间的事。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的逐步兴起，西方经济学开始传入中国。1901 年严复所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由南洋公学印行，这是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最早的译著之一。在之后的几十年中，西方经济学的译著大量出现，一批经典经济学著作被翻译出版，这些译著对中国经济学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在这些译著中，应用性很强的分支学科如贸易、货币、银行、财政、税务、保险等方面占了很大的比重。在西方经济学原理和各分支学科纷纷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人也开始自己研究和出版论著和教材，虽然这些论著和教材在原理上大多都是以西方的著作为基础，但更多地结合了中国当时的实际状况，影响同样巨大。在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几乎同时在中国传播，并逐渐被更多的中国人所接受，其中就有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这形成了经济学在 20 世纪前半叶一片繁荣的景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到极大的普及和发展。20 世纪 50 年代后，中国全面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又融入了许多苏联经济学当时的主流思想。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逐步明确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方向。建立在西方经济学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学，特别是 20 世纪 50 年代后西方学者的新著作和新教材被迅速引进，形成了现代经济学的



习与研究的新热潮。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中国经济学全面学习苏联的时期,欧美国家的经济学研究日新月异,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以及各分支学科都取得了许多新进展。因此,在改革开放后重新引进西方经济学的时候,这些新理论、新方法便迅速进入中国。1979 年 5 月,以陈岱孙为代表的我国 17 位在西方经济学领域造诣深厚的学者联名发起成立“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之后,中国许多著名高校现代经济学研究机构也纷纷成立。

改革开放后对现代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与上个世纪之交西学东渐高潮时一样,主要也是通过直接翻译出版国外现代经济学家的著作以及中国学者根据现代经济学的已有成果结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自己著述这两条渠道进行的。在译著类著作中,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当推中国人民大学高鸿业教授翻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权威代表人物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这本教科书影响了几代中国经济学人的经济学思维和研究道路。北京大学胡代光、厉以宁两位教授编著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1982 年),武汉大学刘涤源、谭崇台两位教授主编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学说》(1983 年)等,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学习研究现代经济学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在历史上起步较晚,1898 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后,在严复校长的主持下,率先开设了经济学课程。1904 年,癸卯学制规定大学堂设立商科,经济学教育开始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最初教师以海归为主,教育和学术以西洋为师。新中国成立后,起先是以苏联为师,按照苏联计划模式发展经济学教育与研究。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引进,翻译教材和原版教材大量进入课程体系,融入现代经济学内容的自编教材更是层出不穷。1979 年北京大学陈岱孙等教授开始组织举办每周一次的国外经济学讲座,从 1979 年 11 月至 1981 年春,共组织了 43 位专家,举办了 60 讲。198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受邀访华,在京做了 3 场宏观经济学讲座。在引进现代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教育的过程中,对计量经济学给予了特别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光远、许涤新和马洪等人倡导下率先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1979 年中美建交后,著名计量经济学家劳伦斯·克莱因(198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率领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

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许涤新和克莱因协商,来年由克莱因牵头,在中国举办经济计量学讲习班。1980年6月,克莱因如约率领邹至庄、刘遵义、萧政、栗庆雄、安德森、安藤等6名教授,在颐和园举办了为期7周的经济计量学讲习班,有100余名中国经济学人参加了培训。后来,克莱因教授被我国多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其中包括我所服务的中央财经大学。

1984年6月,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与国家教委合办暑期教学班;1985—1995年间,在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的推动下,由国家教委和美国福特基金会支持的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项目“福特培训班”举办,并创办了《中国经济》杂志,安排赴美留学生。“福特班”用外国师资培训了一大批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这些人后来大部分出国深造,一部分人学成后回国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其中就有洪永森。1987年,国家教委在执行世界银行贷款第二个大学发展项目期间,国内外20多位著名专家在复旦大学召开的“财经专业教学计划国际研讨会”上提出了从不同专业的课程体系选定若干门作为财经类各专业共同必修课的建议,后经中方专家论证和教育部同意,确定了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经济数学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会计学、统计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发展经济学等11门课程为财经类专业的核心课,并组织编写了11门课程的大纲和教材。1993年开始,教育部在全国部分大学设立了经济学基地班,进行经济学教育创新,培养经济学新人。1994年,邹恒甫在武汉大学创立了“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全面引进现代经济学教育体系,设立数理经济实验班。同年,林毅夫、易纲、海闻等在北京大学创建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1世纪以来,钱颖一、白重恩、李稻葵、田国强、周林、李奇、艾春荣、洪永森等一批在世界名校接受完整经济学教育并获得终身教职的学者应邀回国,在清华大学推进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国际化;后来这批人有的全职回国,有的仍然以特聘教授的方式在国内一批著名高校任教,有的担任经济学院院长,主导经济学教育改革。2005年中央财经大学以团队式引进海归教授的方式成立了“经济学与公共政策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对经济学教育改革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今在海外学成回国的经济学人越来越多,他们已成为改革与发展中国经济学教育的重要力量,对中国经济学



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回顾和梳理这段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从引进现代经济学基本理论,到用这些所学到的理论来革新中国的经济学教育,来分析中国的实际,进而努力参与到国际经济学的对话和学术发展之中,这样的描述较真实地反映了我国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发展历程。这些率先学习现代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人,后来成为运用两种语言、两种思想和学术资源的中国经济教育改革推动者。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通过政府和学校的有力支持,用增量带动存量的办学方法,把现代经济学的学术规范植根在中国经济学教育之中。他们在传播市场经济理论知识和推进现代经济学教育领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中国经济学百年来的发展可以看出,虽然起始于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引进和吸收,但中国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教育始终以中国经济发展为主轴。不论是民国时期经济学各个分支学科的草创阶段,还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起伏跌宕的艰难探索,以及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创新,都是在矛盾、困惑和思想交锋中前行,都是以解决中国的发展为宗旨。因此,发展中国经济就成为中国经济学的第一要义。改革、不断的转型也都服务于发展这一基本要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使得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与教育受到国际学界空前的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谁能成功地解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谁就能够获得诺贝尔奖。2010年,当克莱因教授被问及中国何时能产生诺贝尔奖经济学家时,他说:“当中国的经济学家能提出理论性及科学性的说法,解释中国经济的运转,并说服世界上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时。大概5至10年吧!”这个期许,需要所有的中国经济学人共同努力,勇于创造,才可能实现。

中国经济还在大发展,中国的经济学也需要继续大发展,为中国的强大提供理论支撑。作为经济学同行、新一届经济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同事,我们和广大经济学人肩负着一一起推进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责任,对中国经济学研究和教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怀有殷殷期盼。这也算是我们的“经济学中国梦”吧!而《中国经济学教育转型——厦大故事》正是一本值得那些胸怀这样梦想的中国学人一读的书。

展望未来,在中国经济基础日益雄厚、市场更加开放、社会更具包容的

新的历史环境下,中国的经济学大有希望、大有前途、大有可为。像洪永森教授这样的海归经济学人,还有国内培养的众多经济学同仁,在政府推动、社会互动、民间促动、国际联动的大背景下,必将在与中国经济发展、国际发展的互动中,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筑起参天大厦。

我相信,未来经济学的发展,一定会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上融入更多中国学人的思想与成果,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一定会为中国经济更加健康快速发展、实现中国梦发挥更大作用。

2014 年 3 月于北京



前言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出现过不少传世经典名著,比如哲学伦理学的《论语》、《道德经》,历史学的《史记》,文学的《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军事学的《孙子兵法》,但是却没有出现经济学名著。

中国经济学教育是舶来品。大约在 100 年前,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制度在中国建立。从那时候开始,就有一些出国留学的归国经济学者在中国教授经济学,那时候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与世界上先进国家的经济学教育,在理论体系上是大致相同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学教育转变为以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并且在随后的几十年一直独领风骚。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经济在过去 30 多年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转型: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转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并且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与中国经济转型相对应,在过去 30 多年里,中国经济学教育也处于转型的过程中:从原来以政治经济学为核心内容的经济理论体系,转变为以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为核心内容的现代经济学。这个转型在过去的十几年内趋势日益明显,而且正在不断加速。

进入新世纪以来,一批从海外归来的经济学者,是中国经济学教育转型的重要推手,他们与国内中青年经济学者一道,正在成为一股改革的中坚力量。在中国经济学教育史上,我相信这一代从海外归来的中国经济学家,以及他们对推动中国经济学教育所做的历史贡献,将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和国内其他高校一样,厦门大学的经济学科过去十几年来也处于一个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历史与机缘,十年来,我有机会目睹厦大经济学科的转

型,并参与其中。这本书,就是想真实地记录过去十年来,厦大经济学科如何改革,如何迈向现代化、国际化的历史过程,特别是真实记录厦大经济学科如何在十年前开始启动改革进程,如何创建一个与国际接轨的现代经济学教育与研究机构——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如何全面推动厦大经济学院的改革,如何促进厦大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融合,如何妥善处理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学术制度在融合过程中的矛盾,海归学者如何融入国内体制,以及国内学者如何适应经济学教育的国际化并发挥作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自然地,它也记录了我参与其中的心路历程,以及我对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一些个人看法。“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希望这本书能给那些有志于现代经济学研究的青年学子,那些有志于回国推动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海归学者,以及那些关注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现代化、国际化的热心读者一些有益的启示。自然地,那些关心厦门大学经济学科发展的朋友,更能从中看到厦大经济学科过去十年的进步。

厦大的经济学科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从1921年4月6日建校那天起,厦大就成立了商学部,其中包括银行学和会计学。建校两年后的1923年,厦大成立经济学门(即今天的经济学系),是中国较早成立经济学系的高校之一。经过几代厦大经济学人的努力,特别是由于40年代就加盟厦门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的杰出贡献和精心培养,厦大经济学科涌现出不少优势学科,包括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研究、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经济学说史,以及财政学、金融学、会计学、国际贸易学和统计学等等。作为马克思《资本论》的中文翻译者之一和杰出经济学家,王亚南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分析中国经济现实等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高校按照苏联模式进行院系、学科大调整,王亚南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厦大的第一任校长,将本来已经被决定迁出厦大的会计学、金融学、财政学等部分经济学的师资并入厦大经济学系,为厦大经济学科储备了雄厚的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的师资人才,从而使厦大在改革开放之初便率先在中国综合性大学中成立经济学院,由此成就厦大经济学科的一段辉煌岁月。

在这本书中,我如实地记录厦大经济学科在转型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同时也从制度和文化的层面提到一些厦大经济学科乃至厦大仍需要改进的不



足之处。应该说,这些不足之处,在中国很多高校也普遍存在,甚至某些方面还可能更严重。我曾经不止一次对厦大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海归学者说,厦大经济学科的学术环境在中国高校中算是最好的院校之一。当然,正如厦大校训“止于至善”所要求的,还有改善的空间,因而应该继续改善。作为厦大的校友,我是怀着“爱之深,责之切”的心情来指出厦大的不足之处的。这本书也记录着这十年来在厦大经济学科改革过程中出现过的一些小矛盾与小摩擦。今天,当我们以历史眼光回头看时,大多已成了过眼云烟。在这本书里提及这些小矛盾,主要目的是让那些满腔热忱、富有历史使命感的海归学者在决定回国服务时,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回国服务不但有鲜花和掌声迎接你,也会有各种矛盾和议论在等待着你。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所有困难终究会被克服,而且中国每天都在进步,有很大的事业发展空间。特别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不少学术制度和惯例,如能结合中国实际,是可以改善中国经济学教育、提升中国经济学研究水平的。

这十年,是厦大跨越式发展的十年,也是厦大近百年办学历史中发展最好最快的十年。很荣幸,我也能有机会参与其中,与她一同经历和见证这些激情燃烧的岁月。在中国,做事需要富有热情且持之以恒。能够在厦大坚持十年,首先我要感谢厦大领导的坚定支持,感谢他们为厦大经济学科的改革与转型提供“教育特区”的政策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我也要感谢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广大师生,感谢他们的支持与理解,特别是很多人在个人利益因为经济学科的改革而受到影响的情况下,依然支持经济学科的改革;我更要感谢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事与朋友,他们经常为我排忧解难、向我献计献策、与我风雨同舟。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相信,经历了近百年风雨洗礼,有着辉煌与灿烂历史的厦大经济学科,在一代又一代厦大经济学人的精心培养与浇灌下,必将更加绚烂多彩。我也相信,中国经济学在经历了一次艰难的转型之后,必将浴火重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并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经济学派。



1	〉 序 言
1	〉 前 言
1	〉 第一章 我为什么选择到厦大工作
11	〉 第二章 厦门大学经济学科
31	〉 第三章 国际化办学与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49	〉 第四章 海归学者的引进及其作用
75	〉 第五章 学科建设路线图 ——从计量经济学开始
105	〉 第六章 WISE 模式:学生培养
139	〉 第七章 经济学院的教学改革
153	〉 第八章 经济学院的制度改革与激励机制
169	〉 第九章 打造“学术企业”
187	〉 第十章 构建学术新文化
215	〉 第十一章 中国经济学之路
231	〉 后 记

我为什么选择到 厦大工作

第一章

凤凰树下
随笔集



